

推动“双创”需要耐心和专业

文匯时评
中国新闻名专栏

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,国内逐步掀起了新一轮的创业热潮。同时,诸如创客威客、众创等新兴创新范式的集中涌现,开启了“创新2.0”时代的大门。在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双重驱动下,中国的“创业号”列车正高速行驶在快车道上,并且还将不断提速。

创业类大赛要防止“一窝蜂”

随着各级政府持续助力,全国各地的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势头发展迅猛。无论是在大学校园内,还是产业园区中,抑或是电视媒体上,各种创业创新类的赛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,各类创意秀和路演活动大有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之势。举办各类大赛营造创业创新氛围本身无可厚非,但“一窝蜂”式的上马,不仅让人应接不暇,而且可能对“双创”产生副作用。

首先,创业类大赛数量过多,留给

创业者思考的时间不足。据不完全统计,2015年由各级政府组织面向全国范围的创业类竞赛活动达49场之多,而2016年前11个月则已突破58场,意味着平均每周就有超过1场全国性的创业大赛鸣锣开赛;其次,“同质化”活动面临专业聚焦度不足和“创客”黏度不高的尴尬。虽然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、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等在赛制设计中区分了行业领域,但仍有不少大赛活动既不限主题也不限行业领域,只要是报名参赛的项目都可以同场竞技。这导致了比赛的专业竞争“深度”不足,在比赛“曲终人散”后也很少再有“回头客”;第三,一些比赛过分强调形式和表演,忽略了对内容和技术的关注。目前,“双创”比赛的形式大都采用“台上项目路演,台下评委打分”的套路,由行业专家或者天使投资人组成的评审团队来判断项目高低。比赛舞台的布置酷炫无比,参赛者们个个西装革履、演技十足,夺人眼球的外在形式往往盖过了项目本身的技术性和专业性。

创新和创业都需要一定时间的孕育过程,无法一蹴而就。创意思考需要时

核心观点

创新和创业都需要一定时间的孕育过程,无法一蹴而就。创意思考需要时间,点子转化成现实需要时间,而实践中的打磨提炼更需要时间。因此,应该多留点时间让创新创业者脚踏实地耐心思考,而不能将创业大赛变成“秀场”

间,点子转化成现实需要时间,而实践中的打磨提炼更需要时间。因此,应该多留点时间让创新创业者脚踏实地耐心思考,而不能将创业大赛变成“秀场”。

营造尊重原创的社会氛围

目前,一些公众对知识产权和原创作品尊重意识并不高,而创新创业大赛或多或少会带来些名利诱惑,创业者若抵挡不住诱惑而让创意“早产”,则会引发被抄袭和模仿的风险。当初马云启动C2C项目(后来的淘宝)时,就要求绝对保密,不仅对外不宣布,即便在公司内部,也要把知情人数压到最低,并且与项目参与者签订严密的保密协议,这都是为了保护孱弱的创意“幼苗”。

对此,政府有关部门应适当控制创业大赛的数量,避免许多好的创意和项目“见光就死”。同时,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,营造尊重原创的社会氛围。例如,在学校中开设知识产权内容的课程,从小教育学生“原创光荣,抄袭可耻”;在高科技园区和高技术企业集聚区内定期开展法制讲座,加大对原创精神的宣传推广和对侵权案例的警示教育,将“乐于抄、勇于抄”的风气扭转为“羞于抄、害怕抄”。

比赛管理须精细化专业化

近年来,不少社会闲散资本缺乏有效投资渠道,一部分人将创业创新作为保值增值的潜在出路。由于不少大学生

创业比赛专业性门槛很低,给了少数投机者可乘之机。一些年轻人出于“一夜成名暴富”的心态,将上市圈钱和被收购退出作为创业的初衷,为了结识更多投资者,带着创业不久的公司到处参赛,堪比相亲。这种做法,既不符合追求卓越、精益求精的“工匠精神”,最终也将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。

因此,政府有关部门在策划办赛时应避免粗放式的管理,提高比赛管理的精细化和专业化程度。提倡在高校内或者专业相近的高校之间摆擂台,吸引“极客”“技术宅”们自发开展技艺切磋。针对技术交流活动,给予一定的政策鼓励和资金资助。例如,可以利用现有的校园场地、众创空间和孵化器,为学生或者创业者提供免费的交流场所。对于创客活动,应当多支持、少主导。把舞台交还给技术爱好者,尽量让他们多发挥作用。不能为了追求声势和热闹,而忽略比赛的专业性。

让“双创”活动更加亲民

如何优化“双创”活动形式,美国的经验可资借鉴。1975年,一群狂热的电脑迷在美国加州组成一家名为“家酿”的计算机

俱乐部。“极客”们定期聚会切磋,在台上炫技的和在台下观斗的,都是同一个领域的“技术宅”们。没有评委打分,也没有投资人“过堂”。就是在这种看似简陋的形式和轻松的氛围中,乔布斯展示了其第一台苹果电脑,当场被隐匿在台下观众中的投资人相中。

政府部门在组织创业创新大赛等“双创”活动时,不妨借鉴美国“家酿”俱乐部的活动形式,更加注重形式的“扁平化”和“简单化”,拉近台上台下创业创新者之间的距离,确保交流活动的参与者和观摩者都是专业的“技术圈内人士”。同时,不必专门邀请“高大上”的评审嘉宾,刻意营造出道创业大师和学员间的等级关系,更不能由政府专项资金评审方式的“旧瓶”去装创业创新项目的“新酒”。所谓“技艺有高下,创新无贵贱”,要让参与者感受到,活动主要比拼的是创业创新者脑中的创意和手中的技术,而不是他们的衣着、财富和社会地位。别让那些西装笔挺、高高在上的评委导师吓跑了满怀创新思想的学生和创业者们,毕竟后者才是“双创”活动的“主角”。如此,才能让活动的参与者们心无旁骛,以放松的心态一门心思扑在项目和技术上。

(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、民盟中央副主席、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)



匾额高悬亦能产生持久文明导向

高丽朴代表建议加大保护“中华匾额”文化力度并启动申遗

■本报特派记者 刘栋

“优秀匾额集中国历史之思想、制度、艺术、物质文化诸精华于一身,在民族成长进程中,曾对社会生活广泛发挥主流价值教化的作用,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。”今年全国“两会”上,全国人大代表、北京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研究员高丽朴发出倡议,尽快启动“中华匾额”申遗工作,保护并传承好独具特色的匾额文化。

匾额承载着国人坚守的信仰、名节、担当

匾额,又称扁额、扁牍、牌额,以其多变的式样、高度艺术化的书法艺术,与建筑相互辉映、和谐统一,成为建筑中不可分割的部分。

“匾额与中华文化神、魂、道相融共生,承载着国人坚守的信仰、名节、担当,形态上又辅以恢弘大美的‘榜文’书法,居华夏文明重器高位。”高丽朴介绍,正是因为匾额在中华文化中的特殊地位,至今仍被党和政府于盛事中视作为“重礼”。“2015年,中央代表团先后在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中赠送贺匾;习近平总书记题词的“加强民族团结 建设美丽西藏”金匾、“建设美丽新疆 共圆祖国梦想”红匾。

高丽朴认为,这些足可彰显匾额以其文化的庄重履行着神圣使命,而匾额文化的振兴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,将产生显著有效的积极作用。

匾额文化如今正深陷谷底并缺乏保护

然而,近现代内外战火的摧残以及其他一些因素,使得匾额文化深陷谷底,在岁月中衰微。高丽朴在调研中发现,现在识匾、懂匾、喜匾环境日趋恶化,有匾、存匾、用匾群落锐减。



■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

假使有一本道出天机、助人趋利避害的“天书”,怎能缺少读懂它的人?全国政协委员、著名遗传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贺林在全国“两会”期间递交提案,建议国家对“遗传咨询师”这种新职业加大支持力度,让能读懂“基因天书”的人更多更快涌现,助力“健康中国2030”。

好萊坞女演员安吉丽娜·朱莉通过提前切除健康乳腺以规避乳腺癌风险的故事广为人知。朱莉的这个令人惊叹的决定正是在遗传咨询师的建议下完成的。遗传咨询师扮演了为朱莉解读“天书”的角色,他们就像桥梁,连接起基因诊断和遗传治疗。

贺林说,人所有的基因虽然只包括4种碱基,但通过几十亿次排列组合,形成了一部大书。基因造就了“千人千面”,



优秀匾文字有出处、词词有典故,适宜用各族人民喜爱的形象方式来传播文明,面向青少年和各类人群讲好“中国故事”。图为甘肃武威文庙中由历代进士题写的匾额。

“残存的历史匾额,多碎片状存在于文物建筑、博物馆单位、部分收藏者手中。现在,制匾挂匾于政府空间、公共设施、文化机构或居民家庭,已是小概率现象。”高丽朴感慨,除了活在古装影视作品中,曾经遍布城乡的匾额文化,基本淡出民众日常生活,进而影响到楹联等的存续。

“要对匾额文化的保护工作进行顶层设计。虽然近年来党和政府日益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,但有关部门对匾额文化保护重视不够、认识不足,对匾额文化保护工作没有系统研究、部署和相应规划。”高丽朴表示,现在除了故宫、颐和园等文物建筑群以及国博、军博、首博等文史机构外,匾额主要由一些民间收藏爱好者自发收藏,由于收藏力量有限,一些珍贵匾额得不到及时保护,十分可惜。

摸清底数加大宣传启动匾额文化申遗

“中国是匾额文化的母国和高地,重视匾额文化保护工作责无旁贷。”高丽朴认为,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大对匾额文化收藏与保护工作的系统研究,制定有利于发掘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历史匾额的主题政策,形成科学阐发、积极利用、教育传播匾额文化的专项规划,动员社会各界力量,摸清历史匾额家底与现状,在此基础上形成内容分类、统一抢救修缮保管等大局规则,为合理利用文物奠定前提。

在她看来,优秀匾文字有出处、词词有典故,适宜用各族人民喜爱的形象方式来传播文明,面向青少年和各类人群讲好“中国故事”。她建议,国家有关部门应安排组织社会科学界、史学与国学高校团队,以研究、教学等多种方

式参与古匾的整理考证工作,深入挖掘匾额文化的历史精髓;教育部门应精选优美典雅深刻的名人匾文楹联,让青少年了解匾额,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代代相传。

“政府还应带头加大匾额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,让高悬的匾额,寓意深远的匾文产生持久的文明导向和影响。更重要的是,通过匾额文化复兴,可以同时带动楹联、民谚、谜语等非遗文化分支的重振。”高丽朴说,作为匾额文化母国与辉煌地,面向世界正本清源、完整介绍相关知识与历史,责无旁贷,迫在眉睫。她建议,尽快启动匾额文化申遗工作,将申遗工作列入今年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》的重点项目,明确牵头部门,成立专门团队,尽快制定实施方案,统筹人、财、物等相关力量,迅速开展工作。

(本报北京3月13日专电)

樊芸代表与“转移支付”较上劲——让“国家账本”更公开更透明

■本报特派记者 唐玮婕

她,一袭鲜亮的衣裳、说话语速超快。要是审议预算报告,她可以抽丝剥茧,就这一“国家账本”提出专业性意见建议;要是谈民生热点话题,她会做足功课,三言两语直击“要害”……

这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全国人大代表,就是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樊芸。履职近十年,她的敢于直言和锲而不舍诠释着人大代表应有的责任和担当。

追问“转移支付”

每年全国“两会”,樊芸总会抓住预算草案及报告的重点,谈她熟悉的财政预算话题。

2013年,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,樊芸在现场作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,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系》的审议发言,向总书记反映人大财税立法权、中央专项转移支付不够公开透明、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等五大问题。这是樊芸第一次和“转移支付”较上劲,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。

2015年初,全国人大初审预算报告,樊芸成为参加初审会的9位全国人大代表之一。会上,樊芸翻阅预算资料发现,占中央财政收入近三分之一的转移支付中,有1.5万亿元没有申报单位。于是,她又向财政部部长提出了疑问。

为什么要盯着转移支付?目的其实是要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,让“国家账本”更公开、更透明。“我知道这本账的公开透明不可能一蹴而就,总有一个过程,这几年的专项转移支付增长率已经减少了百分之十几。”樊芸说,“今后,我还将继续关注转移支付相关问题,还要继续追问。”

“多产”背后的功底

今年3月5日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时,她在财税结构改革之外,还专门谈到“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”,建议明确中央监管部门事权和执行力,尽快适应金融混业监管需要,做到监管无缝衔接。

翻看这近年上海团代表提交的议案和建议,樊芸堪称“多产”。2013年,作为召集人之一,她参与在沪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,课题是当时大热的电子商务。调研中,樊芸发现,传统商法难以解决电子商务引发的新问题,包括计算机网络通信记录与电子签名效力的确认等,都需要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来进行规范。最终,调研成果通过一份《关于促进电子商务立法》议案提交全国

人大。

前些年,外资企业在中国企业合作时,常常利用其垄断地位向中方强加一些霸道条款,因而饱受争议。为了搞清楚反垄断法究竟有哪些不足,樊芸在2014年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,花了近十个月深入了解企业需求,还专程到北京和有反垄断职能的国家发改委、商务部、国家工商总局相关人士座谈。当时,正值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。在调研基础上,樊芸于2015年执笔撰写了《关于修改反垄断法》议案提交全国人大。这份议案被列为当年议案,引起各方高度关注。

“人大代表想提出高质量的审议意见,必须要有积累、有功力。”交流起履职心得,樊芸说,“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民主政治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特长,这让我对履职这件事非常钟情。”

关注民生提出前瞻性建议

为了使自己提出的建议具备前瞻性,樊芸总会关注一些民生热点,提前做足功课,“不打无准备之仗”。

“近年来,一些搜索引擎为网民提供了便捷服务,但也存在一些错误、虚假的信息乃至侵权的信息。即使运营商收到投诉,删除信息可能也还需要等上好几天。就在这个过程中,点击量呈几何级数上升,在网上形成了词条,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名誉。”今年,樊芸把目光投向互联网侵害个人隐私的乱象,她讲述的情况让现场不少代表感同身受。

“这些情况前几年处理过一些,但愈演愈烈。为什么得不到遏制呢?就是因为信息运营商只管发布信息——它以‘平台’为由,不承担法律责任。”在她看来,互联网不能成为法外之地,监管部门应当对搜索引擎的页面内容予以规范,建立相应的“负面清单”;同时,必须有错必究,对错误、虚假信息,运营商要及时删除,删除不了的词条要屏蔽相关搜索。

樊芸表示,特别要加快对个人隐私保护权的立法。运营商对于涉及个人隐私的网络文章、网络词条需要承担法律责任,“监管部门不仅要向本地搜索运营商提出要求,还要向国家网信管理部门以及相关部门反映协调侵权问题,使公民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”。

(本报北京3月13日专电)



履职近十年,樊芸(左)的敢于直言和锲而不舍诠释着人大代表应有的责任和担当。 本报特派记者 叶辰亮摄